

※序跋選錄※

《屈大均詩學研究》序

陳 致*

余少喜迦陵詞，上中學的時候，手捧其集，往復吟誦。其中尤喜其贈屈大均一首〈念奴嬌〉云：「靈均苗裔，羨十年學道，匡廬山下。忽聽廉泉涸冷瀑，豪氣軼於生馬。亟跳三邊，橫穿九寨，開口談王霸。軍中毬獵，醉從諸將遊射。提罷匕首入秦，不禁忍俊，縹緲思登華。白帝祠邊三尺雪，正值玉姜思嫁。笑把嶽蓮，亂拋博箭，調弄如花者。歸而偕隱，白羊瑤島同跨。」少時讀此，雖不甚了了，然先賢神采，略可想見。心馳神驚，未能獲已。

後讀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始知屈氏本事。錢林《文獻徵存錄》據《帶經堂詩話》而演繹，尤其詳盡，蓋可見屈氏豪邁不羈之風格。其文云：

屈大均，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少為諸生，遭亂，棄去為浮屠。為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服，更今名。有《九歌草堂集》、《翁山詩外》。王士正嘗語程可則曰：「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薰染，故尚存古風耳。」金陵龔賢稱之曰：「龍章鳳姿，輝映南海。」繆天白（自）嘗曰：「詩有俚語，經顧亭林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今種手，便超。」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月。久之，遊吳。又數年，忽冠服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為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愛其才，以甥妻之。介子敦好述，篤伉儷，賦詩如：「同栖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蓋少室作也。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莧僕不羈。世俗嘲笑之不顧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還粵，妻旋病死。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¹

* 陳 致，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¹ [清]錢林：《文獻徵存錄》卷1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清咸豐八年有嘉樹軒刻本），第540冊，頁428。

今屈指三十年，詞義得解，詞韻尤新。於明清易代之際，才人風概志節，輒心嚮往之。嘗思有作撰著，終以事繁不果。董君就雄，廣東南海人。篤於學，邃於詩，於嶺表先賢，尤多著意。二〇〇二年，攜其詩其文，問學於浸會大學中文系。我自二〇〇〇年任教於此，董君是我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董君劬學，數年遍讀翁山詩，每有心得，頗多勝義。其《屈大均詩學研究》，乃其積年所成之碩士論文。今欲問諸鉛槧，不廢其當年苦辛，誠可賀也。董君是書，綜論起來，有如下特點：

其一，以屈大均的詩論為研究對象。此前學術界對屈大均的研究著重在其生平及詩作上。如香港大學曾漢棠於一九九六年完成之碩士論文《屈大均的生平與思想》，又如近出何天傑著《清初愛國詩人和學者：屈大均》²即著重討論屈的生平交遊、著作及其愛國情懷。端木橋《清初嶺南三大家》一書中第二章曰〈孤忠耿耿屈大均〉，其大略也是介紹屈氏的生平、交遊、著作等，並表彰其愛國主義精神。只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屈大均的詩論的問題，而他們也只是專注於某個具體問題、某個概念或某個方面。一九九六年，當屈大均逝世三百週年之際，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在廣州召開，會後出版《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第三、四兩卷，共收入有關屈大均的研究論文數十篇。其中研究屈氏詩論的有以下數篇：毛慶耆〈屈大均文藝思想評述〉³；楊松年的〈屈大均與後代論詩絕句〉；羅可群之〈詩如其人，詩如其論——淺談嶺南屈宋〉⁴。其中毛文論及屈氏詩論，列舉其文藝思想有不開宗立派、主張文章之外與做人之內兩相結合、其文論詩論往往針對現實而發這三個特點，有一定的見解。類似的意見也見於同書所收程國賦之文⁵。程文從《廣東新語》中〈文語〉及〈詩語〉等卷中所見屈氏思想，總結屈氏的文論為以下三個特點：一，屈氏推崇風格豪邁、氣勢雄偉的詩篇，反對格調低下的綺靡之作；二，屈大均強調詩歌的現實精神，主張現實性與藝術性兩者的統一；三，主張人品與文品之間的統一。程文是基於屈氏部分著作來看屈氏文學主張。像董君這樣對屈氏詩論的全面研究，並且將其散見於多種文獻的詩論加以系統化地闡述，必當有裨於學林。

² 何天傑：《清初愛國詩人和學者：屈大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³ 毛慶耆：〈屈大均文藝思想評述〉，收入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18-234。

⁴ 羅可群：〈詩如其人，詩如其論——淺談嶺南屈宋〉，同前註，頁328-336。

⁵ 程國賦：〈廣東新語的文學價值〉，同前註，頁319-327。

其二，該論文研究屈大均的詩論，又不限於屈的詩論，對屈的詩論的研究，結合其作品和創作實踐，並且源溯流追，就屈大均詩論的來源及其影響皆做了有深度的研究和闡述。如第二章論屈氏之詩學淵源，從其師友交遊及祖述的先賢來論述，頗能揭其根本。第二節言屈氏偏好李白，力追杜甫，實為的論。董君所舉屈氏自言「以太白為師」，「詩法少陵」在屈氏的七律創作中尤能印證。清人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云：

世皆以屈翁山詩五言勝於七言，陳元孝（恭尹）詩七言勝於五言，以為定論。然道援堂七言律高處，視獨漉堂亦無多讓也。今錄數詩於此：〈望雲州〉云：「四望雲州但夕陽，漢家何處有金湯。三年馬首迷春草，八月龍沙怨早霜。夢逐黃河穿塞盡，愁隨鴻雁入關長。平生壯志成蕭瑟，空復悲歌弔戰場。」〈岔道〉云：「軍都下視居庸險，北口高懸太乙軍。一自中官迎白馬，至今新鬼哭黃雲。山連陰嶽當關合，冰抱榆河入塞分。城外風沙橫二路，雲州西去恨無群。」〈夏口〉云：「卻月城臨夏口高，維舟日夕苦風濤。青山表裏惟秋水，綠樹依微是漢皋。南國山名愁大別，楚人天性愛離騷。瀟湘戰後黃雲滿，鴻鵠無心下羽毛。」〈居庸〉云：「軍都關向兩山開，不斷鳴駝塞外來。往日遼金頻失險，只今龍虎枉登臺。城從夏口穿河去，水落黃花繞塞迴。幕府不須懸萬戶，異時華夏自生才。」〈采石題太白祠〉云：「牛渚西河月色新，清光長見謫仙人。詩多諷諫因天寶，道在佯狂得季真。金鉉已銷飛燕口，錦袍空映鳳凰身。垂輝不用多刪述，天與英雄只老春。」〈和人岳王墓〉云：「鄂王墳上哭南朝，聲落錢塘作暮潮。鷗革有膏成碧玉，屬鏤無氣上丹青。松楸亦向黃龍指，風雨難將白馬招。今日卻思和議好，沙場不恨失嫖姚。」⁶

林氏所舉數首七律頗能顯示屈氏寫七律亦有超邁雄渾之風，其與明代前後七子及晚期顧亭林、陳子龍後起力追古典的風氣實有衣鉢相傳之意。前後七子及顧、陳等人皆謹守少陵之律則，而屈氏之七律又溶入了太白放曠飄逸、超邁不羈之風骨。二者看似對立的兩極，而詩人偏能鎔鑄於一爐，此其特異於時人，而能於嶺南獨張一軍之故也。從董君對屈氏詩論與前後七子及晚明其他諸大家詩論的異同之論述中，則屈氏七律創作中這種嶮崎超逸之氣，則至少從其詩歌發展觀和創作論上可以得到解

⁶ 〔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76-177。

釋。

屈氏五言，特著於當時。當時及以後詩人，如朱彝尊、毛奇齡、王士禛、沈德潛等皆極為推許。比較共同的看法是：於嶺南三家中，大均尤以五律勝。朱庭珍《筱園詩話》云：「嶺南三君，藥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當代夸為三絕。」⁷ 屈氏平生亦以其五律自負，據《廣東詩粹》載：「一靈自謂五律可比太白，而氣體亦多似杜。」⁸ 由是可見屈氏之五律實際也是其詩學理論的具體實踐，蓋轉益多師，不以一格限也。錢林《文獻徵存錄》所舉屈氏五言，多見此特性。如〈攝山秋夕〉：「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鷄曉，披衣念遠征。」又舉其〈魯連臺〉詩，及〈送客〉詩：「莫上高樓望，無窮是楚雲。舊遊稀白髮，獨往易斜曛。木落諸峯見，山空一葉聞。祇應盤石上，閑坐對秋分。」〈湘中作〉云：「月出水天分，微茫不見雲。蘆花千萬里，如雪落紛紛。似我愁心亂，風吹不到君。更憐沙上雁，野宿暮為群。」其他摘句如：「山包竊武戍，河遠秀容樓。」「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笙歌喧極浦，風露滿孤舟。」「城臨湘水碧，苑接嶽山青。」「帆隨衡岳轉，雁背碧湘飛。」「慷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馬踏三秋雪，鷹吟萬里風。」⁹ 其五律的確如延君壽《老生常談》所言，能「以古體行於律中」¹⁰，有太白之遺風。

實際不惟取法李杜，屈氏之五言也誠如董君所言，於王維、孟浩然、岑參皆有所師法，其要正如朱庭珍所云：「不拘一格，時出變化，益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說明屈氏在其創作實踐上與論詩之「偏好李白」，「力追杜甫」，「旁及王維、孟浩然、岑參」等是一致的（見董君書稿之第二章第二節）。

第二章第二節言屈氏主張取法民歌，以及第三章論屈氏之詩學本體觀，第七章論及屈氏詩論與明清其他詩論之關係，都議論到陳白沙對屈氏之理論與創作的影響，頗見作者之見地。屈氏為其鄉人梁憲所作〈梁無悶詩集序〉中曾言：「梁子善

⁷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卷2，收入《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356。

⁸ [清]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1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貴陽陳氏聽詩齋刻本），第1712冊，頁110。

⁹ 錢林：《文獻徵存錄》卷1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40冊，頁428-429。

¹⁰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24。

為詩，骨蒼而氣醇，不規規于唐宋作者。而語之至者，體本自然，往往與之合。其資性過人，味道久之，盎然而出，吾嘗以為淵源于白沙。白沙曰：受樸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人如是，詩亦如是。學士大夫不能為之，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七情所發，言之詣乎天理。吾與梁子學白沙先生之詩而不足，反求之於匹夫匹婦，其庶幾得風雅之本歟？」¹¹ 白沙之「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的學說，對後來陽明學的形成影響至鉅。後來陽明學至嘉靖時期而益大，人皆以為匹夫匹婦皆可以成為聖人。屈氏論詩而重視民歌，未嘗不有此時代與思想背景。

其三，董君在寫作過程中參閱了不少相關文獻，對屈大均及其他詩作詩論的分析和闡釋，時有見解及獨到之處。如論及李夢陽對屈氏詩論之影響，董君指出：

李氏認為運用比興以達至諷喻目的之詩篇才是上品，之所以說詩是「感物造端者」，是指詩人因感物而生情，因情而創作詩篇，那麼詩篇一定就所感之物加以抒發引申，亦因為如此，故感人至深。

然而董君又認為屈氏雖議論與李氏相通，又不局限於李氏的觀點上面，而是進一步對比興的運用提出了「氣象肅穆」和「一比一興，情景相生」的兩個境界。其他如論及胡應麟「體以代變，格以代降」說對屈氏的影響，及公安三袁等之求「真我」、「代有升降」說等與屈氏之詩學發展觀之異同等，皆能洞微燭隱。其書之第七章言屈氏關於詩之「天分」與「學力」之辨，已開翁方綱、吳喬之先聲，又論及屈氏對沈德潛、袁枚之影響，皆發前人之所未發，於清代詩論史研究中可備一說。

屈大均生前在詩壇已有大名，當時詩壇耆宿皆推許備至。如顧炎武云：「弱冠詩名動九州。」龔賢稱之曰：「龍章鳳姿，輝映南海。」王士禛稱其為：「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其友費錫璜更說：「南海今推第一人，驚才絕俗許誰隣。千秋方駕遙相許，萬里心期若有神。」¹² 屈大均在明清鼎革之際的嶺南詩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詩論亦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其詩及其詩論的影響並不限於南海，而是波及吳越中原地區。浙江嘉興一帶的著名詩人如周箕（管谷）、郭襄圖

¹¹ 〔清〕屈大均：《翁山佚文·梁無悶詩集序》，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3冊，頁440。

¹² 費錫璜自注云：「屈翁山前輩見余《掣鯨堂詩》，即寄余詩，末一首云：開元大曆十餘公，盡在高才變化中。誰復光芒真萬丈，謫仙猶讓浣花翁。見客時稱余詩不置。」見〔清〕費錫璜：《掣鯨堂詩集》卷13，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康熙刻本），第187冊，頁291。

(皋旭)、繆永謀(天白)等轉相師法,當時稱翁山一派。後世亦多稱清詩有翁山一派,現代學者或以為他是有清一代嶺南詩派之祖,這些說法實不為過¹³。其所以如此,除屈氏詩歌本身的魅力以及他所標舉的風概氣節以外,其詩論亦是不容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能開宗成派,其創作與理論總是相輔而行的,惟屈氏的詩論除《廣東新語》有〈文語〉、〈詩語〉二卷專及文論詩論以外,其他並散見於其詩文書信中,董君的論文注重於對其詩論的蒐求、爬梳、整理和紹介,並且做出深入的研究。余謂翁山得董君,誠三百年之下得一解人矣!

翁山雖有大名於時,然其沒後所遇,誠亦慘矣。清帝之指斥,酷吏之羅織,雖累世而不絕。余讀《清代文字獄檔》,則翁山之著作,於康雍乾三朝,迭遭禁毀¹⁴。屈大均身後,四子明渲託育於友人佟鉉處,其他七個子女皆貧居鄉里。其長子明洪頗能世其家學,亦能詩¹⁵,雍正八年亦遭縲繼之災,更被流配福建,乾隆二年始遇赦放歸。我們從《清代文字獄檔》可以看到,乾隆三十九年兩廣總督李侍堯與廣東巡撫德保,以翁山族孫藏有《翁山文外》一書殘卷又興此獄。即便文網嚴密至此,翁山的著作及其影響,仍在世間流傳,不絕如縷,此亦足見其詩其人的魅力。如康熙朝詩人陳大章《玉照亭詩鈔》中有一詩對屈氏子孫之淪落極表同情。其詩云:「建節持籌寵命新,似聞江海困窮鱗。先聲遙布蘇民望,化雨全資洗瘴塵。獻雉定多重譯客,泣珠還有報恩人。嶺南耆舊凋零盡,珍重停車訪負薪。」詩末有陳氏自注云:「翁山、元孝、藥亭諸君,聞其子孫皆甚貧困。」¹⁶大章,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少侍梁佩蘭、陳恭尹。其子陳師晉於乾隆九年刊刻此集,足見其禁未嚴。用乾隆時再興此案的李侍堯的話說:「顯係查銷不盡。」¹⁷乾隆朝文人龔煒(1704-1770?)在其《巢林筆談》卷二中亦有關於屈大均的譽詞:

徐庶常(致案:當為崑山徐乾學之子徐駿)富于書籍,或疑其剽古句入己

¹³ 如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頁17-28。

¹⁴ 屈氏著作之被禁始於大均康熙三十五年死後。見侯月祥:〈屈大均文字獄案及其影響〉,收入《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頁691。

¹⁵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2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年刊本),第1712冊,頁523。

¹⁶ [清]陳大章:〈敝帚後集(二)〉,《玉照亭詩鈔》卷13,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乾隆九年陳師晉刻本),第8輯第18冊,頁767。

¹⁷ 見〈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塚案〉,收入《清代文字獄檔》,頁201。

詩。然其天才高邁，脫口便有神韻，豈是掩襲得來。予嘗聽其與夢航舅氏（致案：崑山葛萬里）論詩云：「本朝詩人，外論多推屈翁山、王阮亭，次即及我。我以此二人先，沒甚好處。」有恥居王後之意。未免自負太甚耳。¹⁸

可見在康雍朝詩人徐駿和當時人眼中，屈大均與王士禛足可方駕，是清初詩界的兩位宗匠。與徐駿約略同時的宜興文人儲大文（1665-1743）更把屈大均推至清初詩界獨領壇坫的地位。《存硯樓二集》中其序蔣琳雯〈棲桐草序〉云：

比者承學之士，治古文辭高朝宗侯氏、冰叔魏氏；治詩高翁山屈氏。舍朝宗冰叔而言古文詞，非古文詞也；舍翁山而言詩，非詩也。何則？朝宗冰叔之鋒也廉，而其餘胥朽鈍也。翁山之韻也振，而其餘胥窳朴也。鋒若韻殆不足極詩古文詞之詣，而左史風騷遺法，猶未盡亡。并鋒若韻而亡之，則古文詞業不競，而詩法或幾乎息矣。¹⁹

乾隆朝修《四庫全書》，《存硯樓文集》被收入，而《存硯樓二集》則不採用。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也可能與書中有推崇屈大均的文字有關。

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錄》，標舉風節。書中在在稱滿人為敵、虜、夷、韃奴，避明末諸帝之諱，尊明為本朝、國朝，且對江陰、嘉定、揚州諸烈士大書特書，無怪乎自康熙以下，有清諸帝皆指斥之，且必欲禁毀其書。

對屈氏著作之禁自嘉慶朝稍弛，而屈大均其詩其人，驟然復見於文人筆墨中，為人景慕。嘉道時期的詩人陳文述（1771-1843）《頤道堂詩選》中對屈氏推崇備至。如云：「國朝人文二百載，家握隋珠珍享帚。亭林翁山入前代，天民所作得天厚。」²⁰其中以屈大均與顧炎武並列，惟推為前代詩人。又云：「世人學杜不學李，學李之人世凡幾？翁山曠逸過眉山，千一百年惟此耳。」²¹則以屈大均之詩為超過了蘇東坡，雖不免過譽，亦足見其推崇之情。其外集中又云：「近世論詩品，吾意重百粵，天上謫仙人，第一翁山屈。冰雪為心胸，雲霞為體質。離騷與變雅，

¹⁸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蓼懷閣刻本），第1177冊，頁300。

¹⁹ [清]儲大文：《存硯樓二集》（乾隆京江張氏刻十九年儲球孫等補修本），卷5，頁59。

²⁰ [清]陳文述：〈梁溪舟中讀陳其年胡稚威兩先生詩集，因書其後〉，《頤道堂詩選》卷10，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二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第1505冊，頁31。

²¹ 陳文述：〈子堅以新刻自春堂詩見寄，月夜攜登黃鶴樓，讀之。因題一篇，即效其體〉，《頤道堂詩選》卷26，同前註，頁281。

於古亦鮮匹。」²² 嘉道以後，瓣香翁山者，更不知凡幾。故其詩、其人、其文，代有餘馨，其本身的光焰雖經清帝之指斥，文網之嚴密，胥吏之荼毒，不能稍戢。

然翁山之詩與其詩論亦非毫無瑕疵可議者。朱彝尊在其《靜志居詩話》中就說翁山詩：「七言不如五言，五律勝於五古，至歌行長句，可無取焉。」陸繼輅也對翁山的一些詩作略加訾點：

五言近體，調亦不可太高。屈翁山：「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乍讀之，直不減青蓮、摩詰，再讀，則了無意味。至如：「報恩無劍術，乞食有簫聲。」「山光全在水，秋色欲來鴻。」便異浮響。雖唐人詩，以此進退之，可也。

七言律如：「長臂雙如猿有勢，大黃一發虎無聲。」屈翁山句也。「屋上龍交生漢祖，澤中蛇斬應秦皇。」閻古古句也。火氣逼人而讀之索然者，無意故也。俯仰揖讓，情深而文明，是在善學少陵者。²³

陸繼輅言翁山詩格調過高，火氣逼人，朱彝尊言其短於歌行古風，未始不是翁山在創作上一力追求雄直高古，在理論上尊古抑宋，所帶來的一弊。雖然微疵不足掩其瑋質，但如何對翁山的詩文理論和創作做出公允的評價，卻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五十年代以來，由於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很多研究屈大均的文章著作，習慣於從愛國主義、人民性、現實主義、思想性、人品與文品等近乎套路化的方式來評判。往往以現在貌似理論、實為庸俗的概念以貼標籤的方式給古人強加冠帶。雖然其動機是要提攜古人，要他們進步，但如此研究，若起古人於地下，我想翁山等不惟瞞騰，抑且舌撓難下。八十年代以後，思想寬鬆，文禁亦弛，對屈大均生平、思想、詩文作品與理論的研究也由此而更加平實而深入。董君此作在屈大均詩論的研究上正是一項平實而深入的成果，使我們對於屈大均的詩論及其淵源影響、明清之際的詩壇狀況，以及嶺南詩壇之發展流變，有了更深入而切合實際的了解。

董君不惟精於文學研究，自己亦醉心於詩詞創作。二〇〇四年浸大畢業以後，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在城市大學創立了新松詩社，取杜甫「新松恨

²² 陳文述：〈從浣筠假黎簡民五百四峯草堂詩集，翦燭讀之，因題一首〉，《頤道堂詩外集》卷5，同前註，頁451。

²³ 〔清〕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卷1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四年興國州署刻本），第1157冊，頁391-392。

不高千尺」之詩意。詩筒往還，月日無輟。今已哀為一帙，曰《聽車廬詩草》。未幾，董君又入讀香港大學，師從周錫先生，專研明清之際廣東之遺民詩人，其志亦以此補史之闕文。今已獲博士學位，其力學筆耕，成績斐然。當《屈大均詩學研究》問梓之際，董君持卷問序於我，我想到屈大均〈梁無悶詩集序〉中的話：「吾不如梁子，又何以進梁子耶？」董君於明清易代之際之遺民詩人，蒐獵之勤，研覃之精，正期於大成，所以我想：「吾不如董君，又何以進董君也？」²⁴

二〇〇九年二月於香江之凝遠堂

²⁴ 屈大均：《翁山佚文·梁無悶詩集序》，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440。